

宗教・藝術・商業

城市研究論文集

主編 林學忠 黃海濤

中

宗教・藝術・商業

城市研究論文集

District No 3 SEI YING POON



主編
林學忠
黃海濤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阿 桶
□ 封面設計：李婧琳
□ 排 版：黎品先
□ 印 務：林佳年

宗教・藝術・商業 ——城市研究論文集

□

主編

林學忠 黃海濤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2338 傳真：(852) 2713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t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2100 傳真：(852) 2407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

版次

2015 年 9 月初版

© 201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16 開 (227mm×150mm)

□

ISBN：978-988-8366-24-8

序

本論文集收錄了八篇文章，按時序及內容類別編輯。主要是環繞城市的宗教信仰、藝術市場、出版文化、音樂發展以及城市空間分別討論。

黃海濤〈南朝荊州江陵的佛教傳播與發展〉一文，以荊州州治江陵為中心，兼及荊州的整體發展，討論該地佛教傳播與發展，深入探討了荊州佛教盛行的原因和概況、佛教傳播的路線、佛寺分佈、僧官、譯經事業和著述，以及佛教教學等六個重要側面。同樣是探討城市宗教信仰，還有馮志弘〈宋代祭文、廟記中的城隍神論述——兼論歐陽修的祀神與禮法觀念〉一文。文章通過祭文和廟記的考察，考證了宋代城隍神的神格、形象、功能、職責，城隍信仰與佛道觀念，指出了官方／非官方、公開／私人、士大夫／民間的多元城隍想像，並以歐陽修為例，探討了宋代士大夫的祀神與禮法觀念。

徐麗莎〈徽州溪南吳廷、吳楨與松江董其昌的鑒藏活動〉一文，通過分析董其昌與吳廷、吳楨的交往，探討了晚明江南書畫鑒藏活動，特別是徽州書畫收藏之盛，以及當時交易市場之活躍情況。

相對上面三篇古代城市研究，餘下五篇分別從出版文化、音樂、城市空間以及城市設計等角度探討近代以來的上海和香港。林盼〈金粟齋譯書處與《中外日報》的合作——清末上海報館與書局互動的案例分析〉一文，以金粟齋譯書處與《中外日報》之間的關係為例，深入探討了清末上海的報館及書局之間的互動，雄辯地說明了城市發展過程中，各種新知識如何在一個規模宏大、種類繁多的密集行銷網路中得以向民眾推廣介紹。

至於阮弘〈上海國樂研究會在 20 世紀的嬗變與發展——傳統樂種江南絲竹在都市的縮影〉一文，則以上海國樂研究會的創建及其活動為例，深入探討了傳統江南絲竹音樂在近代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從民間娛樂，發展為商業演出、電台播音以至灌製唱片等活動而走上商業化的道路，成功實現了商業活動與文化發展的良性循環。同樣是討論近代上海音樂界的發展，還有張海欣的〈中國音樂現代性裏的分歧與連繫：在殖民時期上海興起的音樂網絡（1919-1937）〉。文中分析了以國立音樂院和大同樂會這兩個分別代表西方古典音樂樂理與傳統中國樂理的音樂組織，利用「網絡」（network）的概念探討了兩者之間的分歧與連結，以「弱勢連結」和「衝突連結」闡析雙方互相依賴與競爭的關係如何在新興的音樂網絡世界重疊，並且塑造雙方新的論述、演奏與作曲實踐。

最後兩篇討論到城市空間和城市規劃問題。錢華〈英商義德與 20 世紀早期香港城市發展〉，介紹了英商義德在 20 世紀初期提出的「賈梅士城」計劃（The Cidade Camoens Project）和九龍塘花園城市計劃，有助於我們了解早期殖民政府管治的城市規劃的特性。李磷〈室內都會與類公共空間——香港的購物商場效應

分析》一文，扼要地闡述了 19 世紀以來香港城市發展的背景與城市規劃的特點，指出了當代香港的大型購物商場如何通過大規模與多功能的模式形成了空間壟斷，而它的出現實際上是城市私有化的現象，促成了「室內」城市與類公共空間的形成，大大地衝擊了都市生活的公共精神。

綜觀本書所收論文，雖然數量不多，但其切入角度、使用材料以及所探討的問題，未嘗沒有其獨特之處。謹呈獻給讀者，祈能收拋磚引玉之效。

林學忠、黃海濤

目錄

iii 序

1 南朝荊州江陵的佛教傳播與發展

黃海濤

101 宋代祭文、廟記中的城隍神論述

——兼論歐陽修的祀神與禮法觀念

馮志弘

159 徽州溪南吳廷、吳楨與松江董其昌的鑒藏活動

徐麗莎

185 金粟齋譯書處與《中外日報》的合作

——清末上海報館與書局互動的案例分析

林盼

209 上海國樂研究會在 20 世紀的嬗變與發展

——傳統樂種江南絲竹在都市的縮影

阮弘

233 中國音樂現代性裏的分歧與連繫：在殖民時期上海興起的音樂網絡（1919-1937）

張海欣

265 英商義德與 20 世紀早期香港城市發展

錢華

281 室內都會與類公共空間

——香港的購物商場效應分析

李磷

304 編後記

305 編者、作者簡介

南朝荊州江陵的佛教傳播與發展¹

黃海濤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經歷三國兩晉，在南方的傳播已經蔚然成風，僧眾數以千計。佛教在中土的流傳，或依山林，或在都城。漢魏洛陽，孫吳建業，後秦長安，東晉建康，佛寺日多，僧眾不計其數。承接東晉，宋齊梁陳期間，建康、廬山、江陵及成都，逐漸形成南朝四大佛教中心，其中荊州江陵更是首都建康以外的佛教重鎮。²

荊州是楚國舊地，承繼了「信巫鬼，重淫祀」的風尚³，故《隋書》云：「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⁴早在三國孫吳時期，佛教已經透過生於中土的大月氏人支謙傳入荊州的武昌。⁵其後，天竺高僧維祇難和竺道炎也來到武昌，與支謙共譯佛經。⁶孫權（吳大帝，182-252，222-252 在位）其後在武昌建築了荊州第一所佛寺——昌樂寺，為荊州佛教發展奠下重要的基石。西晉時，佛教相繼傳至武當山和南郡。⁷晉宋之際，荊州佛教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先後有三個佛教教團來到荊州弘法。東晉中葉，道安（312-385）教團的來到，為荊州佛教發展踏出最重要的一步。哀帝（司馬丕，341-365，361-365 在位）興寧三年（365），道安教團一行五百多人，發自河南抵達襄陽，師徒相率在襄陽和江陵一帶講學弘法，譯經建寺，故湯用彤（1893-1964）指荊州佛教之盛，始於道安。⁸道安高足廬山慧遠（334-416）受

師之命沿河南下江陵，在江陵期間與道恒展開了關於「心無義」的論辯，是荊州首次出現的佛教教義論辯，故稱「荊州論辯」。⁹ 晉宋之際，慧遠教團中的高足如釋曇順（347-425）、釋道溫、釋僧徹（373-452），乃至居士宗炳（375-443）等，都相繼在江陵弘法。北方的玄高教團中人如釋玄暢（418-484）、釋僧印等也在宋初南下，在江陵傳學。¹⁰ 自此，荊州佛教就在三個教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成為了長江中游的佛教重地，尤以州治江陵為講學弘法的中心。本文以江陵為中心，兼及荊州的整體發展，討論六個方面：一、佛教盛行的原因和概況；二、佛教傳播的路線；三、佛寺分佈；四、僧官；五、譯經事業和著述；六、佛教教學。

一、佛教盛行的原因和概況

南朝江陵佛教盛行，是長江中游的佛教中心。¹¹ 曾經在荊州進行佛教活動（包括譯經、講學、受學等）的高僧，今檢得一百零二人，以江陵最多，許多是著名的高僧。¹² 荊州在地理上位處中國的中心，交通便利，水陸兩路，通行無阻，無論是由長安南下江陵的南北通道，或者是由西域東下建康的東西孔道，荊州均是交通樞紐所在，為佛教在該地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臺階。¹³ 在地理和交通這兩個客觀優勢以外，歷任荊州刺史對佛法的推動，也是箇中關鍵。

劉宋時的刺史，對推動荊州佛法發展，有重大的貢獻。南朝實行宗王出鎮各州，以確保政局穩定，尤以長江中游的荊州為要。¹⁴ 出刺州鎮的宗王，多延請名僧隨行。¹⁵ 宋文帝（劉義隆，407-453，424-453 在位）為荊州刺史時，嘗與釋慧觀交

遊。¹⁶ 彭城王義康（409-451）曾從江陵琵琶寺的釋僧徹受戒法，「筵請設齋，窮自下饌」。¹⁷ 江夏王義恭（413-465）出鎮荊州，「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隨行。¹⁸ 臨川王義慶（403-444）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繪有菩薩圖相。¹⁹ 義慶又迎請「家世奉佛」的會稽人安千載隨鎮江陵。一夜，「雜光間出」，州府佐吏和沙門皆一無所見，義慶於是「捧水器」作咒，其後安千載應聲而出。由此可見，義慶是懂得佛教咒術的。²⁰ 衡陽王義季（415-447）求覓高僧，與談佛法。眾人推舉江陵長沙寺的釋曇光。義季遂親至長沙寺請之，予以厚待，給車服人力，月供一萬。義季設齋會，釋曇為導師，習唱制文。²¹ 而且，義季還在江陵上明東寺大殿前建造佛塔。²² 南郡王義宣（415-454）更是一名居士²³，受文帝命出鎮荊州，乃請中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羅（394-468）與之同行。跋陀在華期間，譯經數量最多之時，是在荊州江陵的十年。²⁴ 受義宣之請同行的尚有釋慧璩。²⁵ 釋僧徹死後，義宣也為之造墳塋。²⁶ 義宣在任期間，「尼僧千計」²⁷，並在枝江立精舍。²⁸ 山陽王劉休祐（445-471）、巴陵王劉休若（448-471）和建平王劉景素（452-476）皆曾造訪釋僧隱，劉休祐受戒法，而休若和景素則各至禪房，屈膝恭禮。²⁹ 沈攸之（？-478）初時並不信奉佛教，意欲沙汰僧尼。時長沙寺有千多名僧人，被勒令還俗者數百，「舉眾遑駭，長幼悲泣」，甚至佛像也「流汗五日不止」。攸之驚聞之，召長沙寺高僧釋玄暢，問以究竟。玄暢以《無量壽經》經文回答，攸之問出於何經何典，玄暢如實應之。攸之取經自誦，「尋之殊悅」，於是就不再沙汰僧尼，漸漸篤信佛教。³⁰ 其後，沈攸之起兵荊州之初，甚至命沙門釋僧粲為之占筮，以測吉凶。³¹ 《辯正論》稱義慶、義康和義宣「並懷文藻，大習佛經，每月六齋，自持八戒」，甚至「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至於「篤習文雅」，則以「義慶最優」。³²

劉宋一朝，幾乎每一位的荊州刺史皆篤信佛教。或許他們在荊州進行的佛教活動，並不是完全為了推動當地的佛法發展，可能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對佛法的禮敬。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一舉一動，均牽動着荊州佛教的發展，使之成為長江中游的佛教中心，實在居功至偉。其中尤以元嘉年間的五名刺史（義康、義恭、義慶、義季和義宣）貢獻最大。元嘉之治，佛教為其重要一環。³³文帝自白曰：

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³⁴

文帝信奉佛教，入繼大統之前為荊州刺史，登位後遵從父親武帝（劉裕，363-422，420-422 在位）遺詔以諸王鎮荊，而義康等人既篤信佛理，也推進了荊州佛教的發展。

不過，荊州佛教在劉宋時期也曾經受到挫折。宋末沈攸之沙汰僧尼固然妨礙佛教發展，幸而攸之最後懸崖勒馬，故影響有限。但宋初的謝晦（390-426），卻對佛教充滿敵意，肆意破壞江陵的佛寺。《辯正論》引《晉錄》的記載，指謝晦認為「寺塔不宜人間」，應將所在內江陵城內的佛寺移出城外。³⁵謝晦於是親率隊士八十人至辛寺門，各人手持刀斧，大肆破壞，「尊像縱橫，瓦木傾墜」。³⁶釋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又被謝晦率眾破壞。³⁷謝晦對荊州佛教的破壞，可能源於其對曾經出鎮荊州、信奉佛法的文帝的不滿。

齊梁二朝，刺史亦多禮敬佛法者。宋末齊初，豫章王蕭嶷（444-492）先後引請兩名僧尼至荊州城，增進了佛教的交流。昇明（477-479）末，豫章王蕭嶷迎請從建康西返的比丘尼慧緒（431-499）入荊州城。宋末齊初，益州齊興寺釋玄暢知名內外。建元二年（480），蕭嶷乃遣使益州，迎請玄暢至荊州。玄暢至荊

州後，慧緒遂受禪法於玄暢。由於慧緒深明禪定，緊守戒律，遵行素食，因此豫章王妃及內眷屬深加崇敬，從受禪法。³⁸齊末，刺史蕭寶融（齊和帝，488-502，501-502在位）在蕭衍（梁武帝，464-549，502-549在位）和蕭穎胄（461-501）的扶立下在江陵即帝位，在竹林寺的禪房宴請羣臣。³⁹蕭穎胄行荊州州府事時，迎請建康建初寺釋明徹從行，每日於內第開講《淨名》。⁴⁰蕭穎胄於江陵起事時，就曾經將長沙寺地下的數千兩黃金作為軍資。⁴¹始興王蕭憺（479-522）出鎮荊州時，迎請釋明達（462-517）和釋道仙隨行。⁴²繼任蕭憺的鄱陽王蕭恢（476-526），同樣道仙行以禮敬，並受法戒。湘東王蕭繹（梁元帝，508-555，552-555在位）出鎮荊州刺史，甚至在江陵造天宮寺，迎請襄陽高僧釋法聰。⁴³蕭繹在荊州期間，供養超過一千名僧人，除了天宮寺外，還造有天居寺，並親自講授《法華經》和《成實論》。在江陵建立後梁的宣（蕭簪，519-562，555-562在位）、明（蕭歸，542-585，562-585在位）二帝也在荊州建造天皇、大明等佛寺。史載「一州佛寺一百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⁴⁴，而且「並佛事嚴麗，堂宇雕奇，睹即發心，見便忘返」。⁴⁵這可從釋法京對長沙寺的擴建得到證明，《續高僧傳》云：

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京修造，僧眾湊集，千有餘人。
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稱最，東華第一。⁴⁶

後梁荊州佛法之盛，也是由於宣、明二帝同樣禮佛所致。宣帝撰有《華嚴經》、《般若經》、《法華經》、《金光明》義疏，共四十六卷，並行於世。⁴⁷明帝也撰有《大小乘幽微》。⁴⁸

佛法在荊州士族之間，也廣為流傳。⁴⁹宗炳是廬山慧遠白蓮社十八高賢之一。其孫宗測也敬奉佛法，與族人宗尚之、友人

庾易和劉虬往來講說。⁵⁰ 劉虬也是荊州士族，同樣是荊州著名的居士。他不但集一眾高僧之大成，為《法華經》作注，撰〈《無量義經》序〉，而且與當地高僧多有往還，為西學所師的竹林寺釋僧慧（408-486），與劉虬、宗炳等多有交流。宗炳稱譽僧慧云：「西夏法輪不絕者，其在慧公乎！」⁵¹ 另一名釋僧慧，也與劉虬相善。劉虬在江陵立陟岵寺，請僧慧居之。不但如此，僧慧還常造訪劉氏。⁵² 中山甄恬和南平車曇也曾請僧慧至家。⁵³ 釋慧濟入居陟岵寺，並多次拜訪劉虬。⁵⁴ 劉虬又對江陵三層寺的道綜尼「雅相宗敬」，在共死後，「為製偈贊」。⁵⁵ 劉虬還在荊州招聚徒眾，著名者如庾承先。⁵⁶ 而劉氏死後，「道俗赴葬者數百人」，可見其對荊州佛教界的影響之鉅。⁵⁷ 至於其妻子、兒子等，也敬信佛法。其他荊州士族如南陽新野庾氏、南陽涇陽樂氏、中山毋極甄氏等，大多世奉佛法。⁵⁸ 影響所及，平民百姓也漸漸信奉佛法。⁵⁹ 在敦煌文獻中，更發現到有關這方面的材料。⁶⁰ 梁初譙良顥所造《大般涅槃經》卷十一的題記曰：

天監五年（506）七月廿五日，佛弟子譙良顥，奉為亡父，於荊州竹林寺敬造《大般涅槃經》一部。願七世含識，速登法王無畏之地。比丘僧倫龔、弘亮二人為營。⁶¹

竹林寺建於江陵。譙良顥為父造經，想必不是孤例，應是荊州在家居士為亡故的父母造經求福的風尚。⁶² 這正如梁朝居士劉之遴也因應母親的遺命，損獻三十兩黃金作功德業。⁶³ 另一荊州士族庾子輿，甚至為其父庾域在江陵建造佛寺。⁶⁴ 再者，佛教甚至融入荊州風俗之中，例如二月八日的佛祖出家日、四月八日的浴佛節、七月十五日的盂蘭盆會等，皆是佛教節日。⁶⁵ 由此可見，佛法在荊州士族階層和下層社會普遍流行的情況。

二、佛教流播的路線

荊州位處長江中游，上接巴蜀，下至建康，是沿江傳法的主要路線。南朝時期，京師建康不但是全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心，而且是宗教中心，其中以佛教為最。在皇室的大力推動下，建康成為全國的佛教中心。皇帝大興土木，修築佛寺，禮敬高僧。佛寺和僧人數量之多，是全國各地之冠。⁶⁶許多僧人均從四方八面來到建康，途經荊州講學受業者，不計其數，尤以江陵為要。今將曾在荊州弘法受學的高僧的路線，大致分為以下四類：

1. 建康→荊州→長安
2. 荊州→建康
3. 建康←→荊州
4. 其他

今列表如下：

表一：建康→荊州

路線	時代	高僧
建康→江陵→長安	梁、後梁	釋慧善 ⁶⁷

表二：荊州→建康

路線	時代	高僧
罽賓→龜茲→燉煌→涼州→蜀部→ 江陵→建康	晉、宋	曇摩蜜多 ⁶⁸
江陵→麓山→建康	宋	釋慧度 ⁶⁹
廬山→長安→襄陽→江陵→建康	宋	釋道溫 ⁷⁰

長安→……(遊歷)→荊郢→建康	宋	釋僧弼 ⁷¹
西域→沙河→建康→江陵→益州→江陵	宋	量良耶舍 ⁷²
襄陽→建康	梁	釋僧還 ⁷³
江陵→建康	梁	釋智遠 ⁷⁴
荊州→建康→天台山	後梁	釋智越 ⁷⁵

表三：建康←→荊州

路線	時代	高僧
建康→荊州→建康	宋	釋慧璩 ⁷⁶
江陵→建康→江陵	宋	釋法恭 ⁷⁷
廣州→建康→江陵→建康	宋	求那跋陀羅 ⁷⁸
襄陽→江陵→建康→襄陽→建康	宋	釋曇斌 ⁷⁹
荊州→湘州→建康→彭城→荊州	宋	釋慧球 ⁸⁰
建康→江陵→建康→北徐州→建康	宋	釋曇光 ⁸¹
涼州→平城→代郡→太行→幽州→ 冀州→揚州→荊州→成都→荊州→建康	宋	釋玄暢 ⁸²
荊州→建康→荊州→建康	宋、齊	慧緒 ⁸³
三吳→建康→荊州→建康	齊、梁	釋明徹 ⁸⁴
荊州→建康→荊南	梁、陳	釋羅雲 ⁸⁵
澧陽→建康→廬山→衡山→枝江→ 建康→枝江	後、梁陳	釋惠成 ⁸⁶
益州→荊州→建康→荊州→益州→荊州	梁、後梁	釋道仙 ⁸⁷

表四：其他

路線	時代	高僧
襄陽→廬山→江陵	晉、宋	釋僧徹 ⁸⁸
罽賓國→廣州→長安→江陵	晉、宋	曇摩耶舍 ⁸⁹
西域→江陵	宋	功德直 ⁹⁰
益州→江陵	宋	釋法期 ⁹¹
秦州→涼州→益州→江陵	宋	釋僧隱 ⁹²
蜀郡→江陵→蜀郡	宋	釋法琳 ⁹³
壽春→江陵	宋、齊	釋慧通 ⁹⁴
燉煌→益州→荊州→建康→吳越→建康	宋、齊	釋超辯 ⁹⁵
襄陽→江陵	梁	釋法聰 ⁹⁶
西域→益州→荊州	梁	釋明達 ⁹⁷
襄陽→廬山	梁	釋法歸 ⁹⁸
襄陽→江陵→彭城→廣州→ 湘、郢二州→襄陽	梁、陳	釋慧曠 ⁹⁹
襄陽→衡山→巴丘→江陵	梁、後梁	釋慧耀 ¹⁰⁰
鄴→楚→衡山→荊陝→松滋→荊陝	後梁	釋法常 ¹⁰¹

由上表可見，從荊州到建康的僧人，大多是對建康佛學百鳥朝鳳，紛紛東下弘法受學。弘法方面，有釋僧弼（365-442）。釋僧弼早年入長安，受學於鳩摩羅什（344-413），受到什公賞識。僧弼離開什公，到處遊歷，後南下居楚郢。僧弼在當地講經、戒十多年，大化江左，影響內外。河西王沮渠蒙遜（368-433，412-433）更遣使禮敬，佈施不斷。僧弼後東下建康，住彭城寺，又受